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

主 编 瞿林东
副主编 张 越

——历史学的理论、历史与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

——历史学的理性、方法与历史学家的理性

王明 著
王明 著



商务印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

主 编 瞿林东
副主编 张 越

历史学的理论、历史与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历史学的理论、历史与比较研究/瞿林东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303-08685-6

I. 历… II. 瞿… III. 史学—研究—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0734 号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6 mm

印 张：27.5

字 数：450 千字

印 数：1~2 000 册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0.00 元

责任编辑：李雪洁 装帧设计：孙 琳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董本刚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010-58800825

总 序

2000年11月，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同仁的一件大事，因为这个重点研究基地是全国这方面研究者的共同“平台”。

六年多来，在校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教育部社科司的指导下，我们凭借这个“平台”，在学术研究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而深感这个“平台”设置的必要性及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六年多来，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向全国同仁提出了12个重大研究课题进行招标，得到了热情的响应，使这些重大研究课题都一一有所归属。这些研究课题是：

- (1) 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及理论比较研究
- (2)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 (3)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
- (4)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研究
- (5) 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
- (6) 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 (7)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
- (8) 20世纪西方史学主要思潮及相互关系研究
- (9)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
- (10)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 (11)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研究
- (12) 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

我们设计这些重大研究课题的宗旨是：第一，有益于促进学科建设；



第二，有益于推动历史学的发展；第三，有益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目前，这些课题有的已经结项，有的近于完成，有的正着手研究。

基于上述宗旨，我们还多次主办了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研讨会，它们的主题分别是：

- (1) 唯物史观与 21 世纪中国史学 (2001, 北京)
- (2) 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 (2002, 北京)
- (3) 20 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 (2003, 北京)
- (4) 史学遗产与民族精神 (2004, 温州)
- (5) 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 (2005, 芜湖)
- (6) 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 (2006, 扬州)

这些主题，吸引了国内外同仁的关注，使每一次研讨会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既广泛地沟通了学术交流，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推动大家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在这方面，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受良多。我们以及与我们共同主办研讨会的兄弟单位的同仁，更是深受教育和鼓舞。

六年多来，我们这个研究中心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围绕着所参与的重大研究课题和有关学术会议并结合自己的专长，撰写和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有不少论文是作者多年思考的结晶，有突出的创见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而大部分论文的作者都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可以认为，这些研究论文，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视角，或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其研究所得都对促进本学科发展，丰富本学科内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了广泛地进行学术交流，也为了适时地积累学术成果，我们选编了部分论文，辑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丛书。丛书凡四种，它们是：

- 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历史学的理论、历史与比较研究
- 文明演进源流的思考——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 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
- 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



我们以这套丛书奉献给国内外同仁，以示诚恳请教之意。同时，我们也衷心期待来自各方面读者的有益批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有力的支持，责任编辑李雪洁女士为此书的编辑付出辛勤的劳动，提供许多有益的建议，各位作者给予积极的配合，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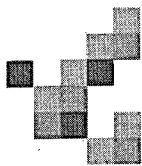
瞿林东

2007年4月30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 1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瞿林东
- 7 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 ■郭小凌
- 24 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
——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 ■晁福林
- 41 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 ■李根蟠
- 84 生产能力决定论 ■庞卓恒
- 107 论通史 ■刘家和
- 120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基本理论的几点认识 ■张子侠
- 136 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探析 ■杨共乐
- 145 实验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 ■陈新
- 159 历史地理解思想
——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 ■彭刚
- 189 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 ■陈其泰
- 212 说“禅”及其反映的王朝更替观 ■蒋重跃
- 228 《商君书》中的古与今 ■许殿才
- 235 董仲舒与汉代史学思潮 ■汪高鑫
- 247 从宋代考据史学到清代实证史学的发展 ■罗炳良
- 267 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
——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 ■向燕南
- 286 晚清国家观变化的时代特色初探 ■徐松巍
- 305 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原因初探 ■张越
- 316 论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 ■周少川
- 329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 ■李珍

- 341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比较研究 ■ 瞿林东
- 368 论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历史思想 ■ 易 宁
- 380 黄宗羲、顾炎武之比较 ■ 周文玖
- 393 历史比较：探寻真正世界性的历史普遍规律
——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比较观 ■ 邹兆辰
- 409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 ■ 乔治忠
- 426 评当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 龚书铎



瞿林东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一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①；关于后者，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述^②。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我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还推动了我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顾颉刚从三个方面比较了 19 世纪后半期同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原因：“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在讲到“新史观的输入”时认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

^① 参见梁启超《新史学》（1902 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 年）。

^② 参见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 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 年）、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1938 年）。



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为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① 诚然，顾颉刚所论，也有可议之处，但他认为“新史观的输入”促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估计，应是符合当时中国史学的实际的。

李大钊批评了“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进而阐明了“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认为：“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②。唯物史观的流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被许多人所认可、运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种种现象，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③ 翦伯赞的这些话，同样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的发展的高度重视。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

二 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是一个人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回答的，我只是根据自己的肤浅认识，讲几点看法，和同行们共同探讨。

① 《当代中国史学·引论》，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②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见《史学要论》，附录188~19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③ 《历史哲学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第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也可以说是要研究整体的历史。一部史学史，至少是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有系统的和整体的研究，是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意识。当然，以往的史学，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等，作有系统的、整体的、科学的把握，确是得益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和指导。

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史学史上的许多先哲，着意于“通古今之变”，不断探讨社会治乱之“理”、朝代存亡之“势”，努力解释“势”与“理”之中存在的“道”，即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与常规，其意颇近于后世人们所说的规律。故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尽管中国学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也有丰富的思想积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是停留在朴素的阶段，从而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过程，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演变、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社会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揭示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也就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可能。

第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大家知道，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经济领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观同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写出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有《食货志》，杜佑《通典》更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杜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史家关于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此后的上千年之中，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进展是缓慢的，并始终带有朴素的色彩。唯物史观的传入，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同样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

^① 《龚自珍全集·尊史》。



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际的意义。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发展到这一阶段，却是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第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司马迁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明清时期史学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要发展到更高、更加理性的阶段，也只是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能达到的。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鸿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①这是对“众庶”和“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合理解释。诚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四个方面，是我就个人的肤浅认识来看，唯物史观是怎样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的。

三 21世纪的中国史学怎样运用、丰富唯物史观

从20世纪中国史学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后者对于前者的意义仍将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的科学程度上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从而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从这两点认识出发，我认为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

^① 《民彝与政治》，见《史学要论》，附录87~88页。



面，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也走了不少弯路。从学理上看，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研究，确有一个发展过程，幼稚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条件上看，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过程，不断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干扰。上述两种情况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即或者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或者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这两种后果的本质是一样的，既曲解了唯物史观本身，又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现在，是到了我们完全走出这个严重教训所笼罩的阴影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像总结成就一样，认真总结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严重教训，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

第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不论是总结成就，还是记取教训，我们都会碰到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这些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关论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用来代替这个体系。其次，它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考验，没有被驳倒，更没有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这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它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从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上这样的启示。翦伯赞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重大问题^①，是从理论上作出的精辟论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身份的分析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对人、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结论。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还有很多可以借鉴

^①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三，59~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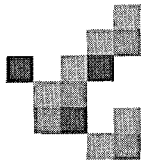


的地方。事实证明，唯物史观不会窒息人们的创造力，而是要我们去发现这种创造的方法和途径。

第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这是从以往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也是从近2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一定要排斥任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对于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应当予以吸收，为我所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唯物史观在同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比较中显示自身的特点和活力，一方面也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容。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唯物史观仍将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新问题的基本理论；而新的理论认识的创造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需要我们在上述几个方面都付出艰苦的努力。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郭小凌

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

新世纪的第一年，《历史研究》发表了蒋大椿先生批评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文章。^①我国史学界并未对此感到特别惊异，相反却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就蒋文提出的问题展开了平心静气的讨论，从而构成新世纪中国史学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唯物史观从注释对象变为研究对象的这种角色转换，在奉唯物史观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施之万代而不惑的绝对真理的年代是难以想像的，这使人不禁感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界在观念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蒋先生的文章触及我们许多人的心理障碍，就是在理论创新的时候能不能突破或允不允许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坚决否定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真理。这种否定不仅基于他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微不足道（“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②）的认识，而且源

^① 该文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



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认识活动^①），所以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神化是违背马恩原意的，是马恩的学生们怀着对老师的过分崇拜而好心办了坏事。当然，在以往的造神活动中，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借神化马恩来神化自己。

科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正因如此，这一领域的人们不会提出坚持或捍卫某种现成的理论，相反却欢迎对现有理论的不断修正，欢迎推翻现有理论的不断尝试。社会科学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既然是科学，并且大家都认识到它需要创新，那就应该允许对基本原理的超越。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根本性的原则，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空洞的原则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原则往往在这里要让位于实践。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哪条原理呢？但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原理，也符合理论思维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蒋先生在理论探索的层面上捅破了这层纸，因此他完成了一项令人肃然起敬的工作。

在对蒋先生表示敬意的同时，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一样^②，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已不能适应现实史学认识的需要，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笔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存在缺陷，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缺陷，但这些缺陷还算不上是致命性的，当代生活本身仍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37~3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最精彩的思想。

^② 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